

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

郑欣森

内容提要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则是辛亥革命未竟之业，标志着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在文化领域的胜利。然而，由于文献记载和档案资料稀少零散，加之辛亥革命发生与故宫博物院成立相隔时间较长，辛亥革命对故宫博物院建院的推动，以及故宫博物院开院之于辛亥革命事业的意义，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外相关研究也十分薄弱。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及档案，本文以政治内涵、文化认同和博物馆事业为视角，阐释了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力图客观地呈现当时社会事件的历史情境。

关键词 辛亥革命 溥仪出宫 故宫博物院 标志性意义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1925年成立的以明清皇宫紫禁城及其皇家收藏为基础的故宫博物院，就与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有着直接关系。但是，从辛亥革命发生到故宫博物院成立，其间相距14年。这14年中，末代皇帝仍“暂居宫禁”13年，丰富的文物珍宝仍为皇帝的私人财产。这是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表现。这14年也是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时代的潮流，社会的进步，由修改优待清室条件，到驱逐溥仪出宫，把皇家收藏变成全民族的文化财产并赋予其新的意义，终于建成一个有着崭新形态的公共文化机构，其间充满着惊心动魄的斗争。

参与故宫博物院肇建的吴瀛先生就曾感慨：“夫由一故宫蜕化而为博物院，此为国体变更应有之结果，若法、若俄、若德，何莫不然，则故宫之为博物院，一刹那顷之事耳，何有于若干年之经过？”^{〔1〕}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成果和影响仍然为博物院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故宫博物院的问世则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

〔1〕 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一，页1，故宫博物院编，1932年。

民主共和政体是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驱逐溥仪出宫并成立故宫博物院，使皇权最重要象征的紫禁城内廷向普通民众开放，对于强化民主共和观念、彻底粉碎国内复辟帝制思潮有着标志性意义。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而且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成果就是国体变更，即政治体制的根本改变。这是一次历史巨变，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共和时代。“百代都行秦政法”，自秦始皇以来所形成的以大一统、极度中央集权和绝对专制主义皇权为特征的中国式的历史道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华民族在这条道路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但是专制统治的长期延续和极端化发展，却严重阻滞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使中国社会陷入落后的深渊。1911年12月南北和谈中讨论国体问题，即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南方代表伍廷芳阐述了南方坚持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的理由：“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重新缔造，我意以此说为确不可易。”北方代表表示并“无反对之意向。”^{〔1〕}辛亥革命打倒了专制皇权，废除君主制，建立民主政体，实现五族共和。民主与共和是相联系的，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家权力机构和国家元首均由选举产生，这种政体形式即共和制。是否赞成共和，成为是否拥护中华民国的最重要条件。1912年2月12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隆裕太后代行颁布退位诏书，其中说道：“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2〕}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表示绝对赞同共和制度，“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宣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3〕}。

皇宫是皇帝生活居住、处理政务的场所，亦即“朝廷”所在地，是权力的中枢。雄伟壮丽的皇宫建筑充分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宫廷生活的奢华、收藏的丰富以及它的神秘性，使其成为封建统治的重要象征。由此，辛亥革命的对象首先在紫禁城，无论如何，应该把专制君主从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皇宫驱逐出去。但是，清朝覆灭了，最后一个皇帝却仍住在宫里，且一住就是13年。溥仪能居住下来，是根据清室退位优待条件。1912年南北双方在和谈中涉及到对清朝皇帝、皇族的待遇问题。处置清室的基本办法是：清帝退位，给予优待。有关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是经过南北双方反复商讨后确定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清室的意见。当时提出的待遇条件有“以待外国君主

〔1〕 转引自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国近代史》第五卷第七章，页45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2〕 转引自上揭《中国近代史》第五卷第七章，页489。

〔3〕 《袁世凯致南京孙大总统、参议院、各部总长、武昌黎副总统电》，载《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见《辛亥革命资料》（《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页117，中华书局，1961年。

之礼待之”、“退居颐和园”等，后清室提出要保存大清皇帝名号，并要“世世相承”，“仍居宫禁”等条。孙中山、黄兴坚决反对。1912年1月18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提出修改意见：“一、名号定为宣统皇帝，删去‘世世相承’四字。二、退居颐和园。”同一天，黄兴也致电伍廷芳，痛斥：“议和愈出愈奇，殊为可笑！第一条仍保存大清皇帝之名称及‘世世相承’字样，可谓无耻之极。第二条‘仍居宫禁’，是与未退位无异。第一、第二，为我军人之绝对的反对！”后在“若清帝退位，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枝节，似可从宽”的思想指导下，作了让步，稍加修改。正式公布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共八款，最主要的是两款：“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王之礼相待。”“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①“暂居宫禁”，没有规定具体期限，只划定了宫禁范围，在乾清门以北到神武门为止这个区域，即“内廷”。作为明清皇宫的紫禁城，分外朝、内廷两大部分，外朝是朝廷举行盛大典礼及部分办事机构的活动场所，内廷是皇帝处理政务及帝后皇室人员生活起居之处。相比之下，内廷更为重要，且皇室珍藏等都主要集中在内廷。中华民国成立后，外朝部分即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及文华殿、武英殿等交给民国政府，而溥仪仍居住在內廷。

对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这一历史功绩与重大意义，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认识。有学者指出，过去我们往往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甚至更多地讲其失败和消极面，是不全面的，这既有认识原因，也有时代原因^②。从认识上讲，后来的评价者对辛亥革命缺乏亲身体会，因此导致认识上的低估。亲身经历这场革命的林伯渠同志（他是1905年8月第一批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在1941年辛亥革命三十周年时撰文指出：“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③。从时代上来看，辛亥革命发生了，取得了伟大胜利，但社会性质还未完全改变，还有许多革命工作要做。例如，打击和粉碎民国初期的复辟逆流，巩固民主共和体制，就是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

民国成立后，存在一股企图使逊清废帝溥仪复位的逆流，溥仪仍居住紫禁城，便成为形形色色复辟派的一个希望。致力于匡复清朝的，既有逊清遗老，也有以满籍王公宗室为中心的宗社党，还有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分子，也有一批任职于民国政府的前清旧官僚。溥仪回忆说：“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④当“满洲帝国”的皇帝，是日本人的阴谋，也使溥仪走上了卖国的路子。在紫禁城里发生的

① 转引自前揭《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第七章，页487—488。

② 《张岂之、金冲及对话辛亥革命》，《中华读书报》2011年4月13日。

③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④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三章，页59，群众出版社，2007年。

是“丁巳事件”与“甲子阴谋”。“丁巳事件”即1917年(丁巳年)的张勋复辟。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的“府院之争”的名义,以十三省军事同盟“盟主”身份,从徐州率兵进京,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并驱走黎,7月1日伙同康有为等拥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恢复前清官制。溥仪在乾清宫坐上皇帝宝座,北京城里到处挂起了龙旗,满街上是穿着清朝袍褂的人。但是这一闹剧只持续了12天。“甲子阴谋”是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7月在点查清宫养心殿时,发现有1924年(甲子年)春夏间康有为、金梁等奏陈图谋复辟的多种密件。说明他们的复辟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今天来看,这种逆社会潮流的图谋十分愚顽可笑,但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时皇帝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及思想体系仍然存在,或未受到很好批判,因此被赶下台的溥仪不仅要复辟,而且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要过过皇帝瘾,在太和殿里接受朝臣的祝贺,当起了短命的洪宪皇帝。

对于优待清室条件,溥仪小朝廷一直十分重视,一方面担心民国取消优待条件,一方面又深惧民国彻底执行优待条件第三款的规定事项,心情是相当矛盾的,因此他们坚持把优待条件列入宪法。袁世凯曾在优待条件上有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①民国三年(1914)5月1日,袁世凯欲为其帝制铺路而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其中第六十六条云:“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所宣布之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清皇族待遇条件、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自是优待清室条件载于民国约法,其效力愈为稳固。民国五年(1916)8月1日,民国国会重新在北京召集,宪法会议亦于9月5日继续开会,清皇室即请北京政府咨文国会,将优待条件列入宪法,旋有梁鼎芬、达寿、世续、陈宝琛等请愿于国会,国会议员中亦有王谢家、魏肇文、李振钧分别提案,以为有加入之理由。民国六年(1917)2月,民国副总统冯国璋自南京行抵北京,致函众议院,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加入宪法,以杜倡言复辟者之反侧,然未为国会所接受。同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前后,有人主张严惩清室,取消优待条件;有人则为清室开脱,多方回护,结果北京政府决定优待条件继续维持,永资遵守。民国七年(1918)10月到十一年(1922)6月,著名的复辟派分子徐世昌任民国总统,在其任内,清室优待条件自然得保无虞。

对于优待清室条件,反对者以及主张取消者亦不少。民国十一年6月,徐世昌下台,8月1日旧国会恢复,即有少数态度激烈的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清室条件,如议员邓元彭等提出,“我中华民国既定为共和政体,一切人权平等,无特殊阶级,昭垂中外,十有一年于兹矣。何物溥仪,不知自爱,生存于五色国旗之下,胆敢藉结婚之仪仗,特标榜其黄龙旗大皇帝之徽号,形似滑稽,事同背叛”,认为“不合潮流,不适国体”,建议“将优待条件取消”^②。1924年春夏间,议员李燮阳在国会

① 转引自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二章,页66,群众出版社,2007年。

② 转引自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五章,页388,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

中又提出类此议案。同年4月20日，溥仪召集近支王公、内务府各大臣会议，谋应付民国国会提案取消清帝尊号及优待条件办法。不久北京政变发生，优待条件虽未取消，却有重大修改^①。

历史的潮流毕竟阻挡不住，民主共和的观念也在逐步深入人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直系以失败而告终。黄郛内阁摄政时间从11月5日起至11月24日“临时执政政府”成立结束。在此期间，冯玉祥做了一件大事，即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由摄政内阁通过《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条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黄郛摄政内阁在公布修改优待清室条件时，特别昭告全国，说明修改的原因：“民国建国，十有三年，清室仍居故宫，于原订优待条件第三条，迄未履行，致民国首都之中，尚存有皇帝之遗制，实于国体民情，多所抵牾。爰于十一月五日，与清室溥仪商订修正优待条件。”^②

清室王公大臣、著名遗老等闻溥仪出宫，均大为惊骇悲愤，奔走呼吁，希图有所挽救。时在天津的段祺瑞，以清室逊政非征服可比，迫令移宫有背优待条件，应从长计议，俾免民国受背约之嫌。冯玉祥等旋复一电云：“清室为帝制余孽，复辟之祸，貽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存私号，均为民国之耻。留此孽根，于清室为无益，于民国为不祥。此次移入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却共和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③1924年除夕，孙中山到京，卧病北京饭店，清室遗老旧臣宝熙、绍英等人又致书孙中山，称“优待条件，为民国产生之源本，自宜双方遵守，垂诸无穷”，而今溥仪“乘舆仓卒出宫”，已违“最初之信条”，故而请求“主持公道，力践前言”。中山先生即命秘书处复函，严词驳斥，指出首先是清室违反优待条件，终未践移宫之约，又于文书契卷仍沿用宣统年号，民国六年复辟之举，乃实犯破坏国体之大咎。并指出“吾所以认十一月间摄政内阁之修改优待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④。所有支持驱逐溥仪出宫者，都把这件事与推行民主共和政体、杜绝复辟祸根联系在了一起。

在查点清宫物品的过程中，善后委员会与清室及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反对、抵制、阻挠等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开展工作并为成立博物院作了充分准备。特别是1925年7月在养心殿发现清室密谋复辟的罪证，认为事关国家共和政体的安危，当即抄录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后转向京师高等检察厅)，请其对有关人员分别提出公诉，在段祺瑞执政府包庇下，最后却不了了之。清室善后委员会鉴于情势之孤危，非急急成立博物院，使速成公开之局，无以杜觊觎之心，遂于1925年10月10日，即中华民国的国庆双十节，正式宣告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开幕典礼的讲话，充分揭

① 参阅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五章，页388，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

② 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一，页10，故宫博物院编，1932年。

③ 前揭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五章，页414。

④ 上揭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一，页27。

示了故宫博物院的意义。前摄政内阁总理、理事黄郛发言中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执政府外交总长、董事王正廷在发言中说了自己的两点感想:一是真正收回民权,二是“双十节”的特殊纪念。京畿警备司令、董事鹿钟麟说,过去有“逼宫”的戏,他的“逼宫”,则是为民国、为公而“逼宫”。他们的讲话,都受到与会者的欢迎。^{〔1〕}应该看到,民国初年,西方民主思潮与实践颇为盛行,后来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独掌北京政府,逐步废弃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各项民主制度。但是,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共和民主制优于君主专制,已成为国人思想理念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尽管民国年间的共和民主制暴露出种种不足之处,名不副实处甚多,但其在形式上的至高无上仍为多数国人所公认。民国实行民主共和的体制,把破坏博物院视为“破坏民国之佳节”,说明故宫博物院对于坚持民主共和体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因此是需要保卫的。

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后果和影响,美国学者林蔚对此作了新的诠释。他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最后结果是直系的崩溃最终引发整个北洋体系的崩溃,造成某种权力真空,从而为新的观念、新的社会群体以及新的政治权威提供了演出舞台。他说,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界标性的大事件,它宣告了新型民族主义运动和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五卅运动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以往的单纯抗议型民族主义运动。此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不仅以压倒优势获得各阶层广泛而深刻的同情与支持,而且,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为清楚的政治目的与政治眼光,军阀和帝国主义一道被视作中国的敌人,从而使南方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主张的国民革命有了明确的内涵和目标,这就是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的统一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运动。他认为,“五卅”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来自下层的爱国主义运动,而首先是既存权力结构分崩离析的象征。蒋介石所操纵的国民党正是利用北洋体系因内斗而崩裂的机会,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性运用,迅速崛起填补了权力真空,成为当时全国统一诉求的代言人和执行者^{〔2〕}。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不是临时的仓促决定。战前孙中山国民党人已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密切联络,以冀实行推倒曹吴的“中央革命”计划。李煜瀛回忆说:“辛亥革命虽小告段落,实则革命实力迄未达于北方。然革命同志无不欲作北方革命首都革命以期普遍。抱此志愿者为数甚多,就我个人所知武装同志中如冯焕章(冯玉祥)、胡立生(胡景翼)、孙禹行(孙岳),非武装同志中如黄膺白(黄郛)、段子均(段宗林)及吾个人皆从事于此。膺白多致力于焕章方面,子均与吾个人致力于立生、禹行方面,为秘密工作之进行,此国民一二三军未张其帜以前一段之经过,亦即使溥仪出宫间接之工作。”^{〔3〕}

〔1〕 前揭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一,页54。

〔2〕 转引自马敏:《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新诠释——林蔚著〈从战争到民族主义:中国的转折点1924—1925〉》,载《拓宽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页356—357,华中师大出版社,2006年。

〔3〕 李煜瀛:《故宫博物院纪略》,《故宫周刊》总第2期,1929年。

从多种文献可以看到，正在壮大的国民党积极参与并指导了驱逐溥仪出宫，以及筹建博物院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为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李石曾当选为中央监察员，并被推选为“北京监察委员”。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以李石曾先生为委员长，委员如黄膺白、蔡子民、吴稚晖、汪精卫、易寅村、张溥泉诸先生，均国民党之彦，而鹿瑞伯为驱逐溥仪出宫之执行者，同时为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为委员，故当时参加同人，多数为国民党或接近国民党者”^①。北京政府初虽称与民党合作，而实则不然，清室则乘机阻挠点查工作，其后北京政府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及其嬗递之故宫博物院，遂时时处于相对地位。但是，清室善后委员会能够不屈服于各种压力，坚持斗争，北京政府虽眷顾于清室，为点查工作设置了种种障碍，终于未能阻挡住故宫博物院成立的趋势，当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这种新的形势有关^②。

根据修改的优待清室条件，溥仪已永远废除了皇帝尊号，为中华民国国民的一分子，并理所当然地被驱逐出了内廷，使这个作为封建皇权最重要象征的宫苑禁区，变为平民百姓可以自由参观的场所，将作为君主法统象征和仅供皇帝观赏享用的珍宝文物，变为全民族的共有财富。这就明确地昭告世人，封建君主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已真正地被推翻了、结束了，任何企图恢复帝制的行为都是倒行逆施，都是不能得逞的。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在这方面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二

皇家收藏有其特殊内涵，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使象征皇权统治继承性、合法性的清宫旧藏成为人民共有共享的文化财产，并赋予而且不断强化着其民族文化血脉的新意义，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文物珍宝的收藏，这些收藏不只因其珍稀宝贵，而且与政权继承及其合法性有关。周代即收藏象征王位的祭器，被称为“宝器”，为传国之重器。文物珍藏的聚集可被视为天命所归的象征。因此，新的王朝接受前朝的旧藏，表示着它继承前朝的天命，是确定其统治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清宫收藏在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清末国力衰微，外患频仍，这些文物又多次遭

① 前揭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一，页1。

②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清室方面遂暗中与段临时政府沟通，攻击清室善后委员会，力图实现溥仪复宫。政府方面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纠纷开始。12月21日，段临时政府秘书厅致函内务部及警卫司令，着停止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22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点查预备会议，会议一致通过断然拒绝接受段政府停止点查的命令的决议，并函复内务部难以中止点查，后在有关方面斡旋下，临时执政府又同意进行点查。参阅《故宫博物院八十年》页24，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李煜瀛说：“段之时期，国民军仍握北京兵力。关于此事（按：指干涉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工作），奉方亦不助段，故无能如何于故宫事也”。见李煜瀛《故宫博物院纪略》，《故宫周刊》总第2期。

到劫掠或毁损，但仍然极为宏富。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暂居”紫禁城宫殿，围绕这些清宫旧藏的所有权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和斗争，争论和斗争的过程，是对这些藏品的性质的认识以及赋予新意义的过程，其所有权的最终解决，促成了故宫博物院的诞生。

在封建时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帝王的，皇宫里的所有物品，包括文物珍藏，自然都是帝王的财产，谁也动不得。康熙皇帝曾规定，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养心殿的一个景泰蓝小罐里盛着36个一寸长的干草棍，他拿了几根放在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了一根都不行。这叫“寸草为标”。溥仪曾回忆：“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无限的愤慨。”^{〔1〕}不仅溥仪认为清宫旧藏是他的私人财产，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文物产权属于皇室。皇室的财产不只在紫禁城，还包括沈阳奉天行宫和热河避暑山庄的珍藏。1914年民国政府在紫禁城外朝即三大殿一带成立古物陈列所，陈列从今沈阳和承德皇宫运回的珍宝，共约70万件之多。民国政府认为这些宝藏是皇室私有财产的一部分，由清室派员约同古玩商家逐件审定估价，有些物品由于是无价之宝和稀世珍品而无法估计。根据皇室与民国的双边协议，所有物品中，除了皇室收回的以外，均由民国政府按估定的价格收购。由于财力紧缺，民国政府不能当即支付购买款项，这些宝藏暂被当做民国借自皇室的债款（总计3511，476元），直到民国财力允许彻底支付时为止^{〔2〕}。

对于清宫旧藏是否为皇室财产的争论，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这与当时清宫所藏的文物珍宝的厄运有关。当时引起社会关注的，是逊清皇室对宫中文物珍宝的大量抵押、拍卖活动。

辛亥革命后，根据国民政府所议定的《清室优待条件》第二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但由于逊清皇室任意挥霍及其内务府人员的中饱舞弊，往往入不敷出。而民国政府所负担的经费，也往往因为财政困难而不能如期按数拨给，清宫只好靠借债抵押维持。溥仪全宗档案的一份材料，记载了溥仪小朝廷在多个年份欠债的记录，例如：“宣统八年十二月份（按：根据《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宣统退位后，可保留其“尊号”，所以溥仪小朝廷一直沿用其“宣统”年号）：欠恒利号商借垫银二十八万五千零五十五两九钱一分六厘八毫四丝；欠亨记号商借垫银六千八百五十二两六钱四分；欠大清银行借垫银十四万两，除欠内帑银七万五千六百两；除欠泰元号商借垫银九万六千零五十两二钱二分；尚欠交通银行借垫银三万九千六百两；除还尚欠中国银行浮借银三万六千两；新欠中国银行息借五十万元，计折合银三十六万两。”^{〔3〕}

为了还债，筹款的办法之一就是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珍宝、古玩等。民国十一年（1922）1月，

〔1〕 前揭溥仪《我的前半生》，页37。

〔2〕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页23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

〔3〕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溥仪全宗档案一二一六号，转引自叶秀云：《逊清皇室抵押、拍卖宫中财宝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内务府在一份公开出售珍宝古物的招商广告上写道：“兹因经费拮据异常，现将库存古瓷、玉器、古铜约五百余件，招商出售，藉资补助。凡属殷实商号，有愿承购此项物件者，由一月七日起至十一日止，赴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检阅详章，交纳保证金一万元，应以本京殷实银行现银元存单为适用，发给估价物类单一份，听候定期看物估价。”¹ 拍卖珍宝仍满足不了所需，还经常拿出一些金银珍宝抵押和变价，每年都有好几宗。1924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之手，向北京盐业银行抵押金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款数80万元，期限1年，月息1分。“合同内规定，四十万元由十六个金钟(共重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作押品，另四十万元的押品则是：包括八个皇太后在内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一万零九百六十九两七钱九分六厘；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计重八百八十三两八钱，嵌镶珍珠一千九百五十二颗，宝石一百八十四块。另外还有玛瑙碗等珍品四十五件。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物件当作荒金折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²

对于清室拍卖珍宝一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1923年9月26日发布公函，表示坚决反对，并认为这些珍宝应由民国收回并保管：“据理而言，故宫所有之古物，多系历代相传之宝器，国体变更以来，早应由民国收回，公开陈列，决非私家什物得以任意售卖者可比。且世界先进各国，对于本国古代之遗迹古物，莫不由国家定有保护之法律，由学者加以系统的研究，其成绩斐然，有裨于世界文化者甚大，而我国于此，尚不能脱离古董家玩好之习，私相授受，视为固然，其可耻孰甚。况日本经此次之大地震，遗迹古物之损失极多，我国于此担负保存，及整理关于东方考古学的材料之责任，亦因之愈加重大。北京大学对于此事，似不能坐视不问，为此函请将此事递交国务会议，派员彻底清察，务须将盗卖主名者，向法厅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³ 湖北省教育会1923年11月12日致电内务部，要求制止清室出售古物，认为这些古物寄托着立国精神，不能散失：“顷阅各报载有清室售卖古物一则，不胜骇异。窃我国与埃及、希腊、印度同为数千年前古国，其文明久为中西所称羨。清室之古物，尤为历代帝室递嬗相传之珍秘，并非一代一人所得私有。合全国五千年之文物，集于首都之清室，一涉疏忽，不徒散佚堪虞，即立国精神且将无从取征。清室以经费短绌，转售东邻，不啻将五千年立国精神捐弃一朝，言念及此，能勿痛心。……方今欧美各邦对于古物之保存，法有专条，诚知立国精神，舍此无所寄托。……敝会悯文献之失征，痛国粹之沦胥，不揣冒昧，吁恳大部设法妥为保存。并乞提交阁议，作为专案，妥筹善后办法，勿使数千年之文物失于一朝。国家幸甚！教育幸甚！”⁴

〈1〉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溥仪全宗档案一二一六号，转引自叶秀云《逊清皇室抵押、拍卖宫中财宝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2〉 前揭溥仪《我的前半生》，页111。

〈3〉 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委员会：《北大请禁清室盗卖古物》，《申报》1923年9月26日。

〈4〉 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页222—22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923年6月27日故宫建福宫花园大火，敬胜斋、静怡轩、延春阁一代焚烧殆尽。此处许多殿堂库房都装满珍宝玩物，是当年乾隆皇帝的珍玩，乾隆去世后，嘉庆把所有宝物封存起来。有的库房至少100年未打开过。这里还有溥仪结婚时的礼品等。火灾的损失是巨大的。已有舆论指出，所烧毁的是国家的财产，与民族历史有关：“自清帝退位之日起，一切主权，已移于民国，则今番千万以上之损失，实民国国家所有之财产也。非但物质上横遭暴殄，而与历史有关之古物尽付一炬，则尤为堪痛也。因清室不肯遽行迁让之故，使民国所应保存者皆葬送于咸阳焦土之中，其责任应谁负之？此岂可以勿问哉。宜速将溥仪及其家族为适当之处置，以杜将来祸源，而正中外观听。”¹

对于清室珍藏的所有权争论，是与其所具有的特殊价值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教育界、知识界有关机构呼吁这些清宫珍藏关乎中国历史文化，是历代相传之物，应属国有。一批国会议员又根据中华民国宪法²，要求具体立法并执行：“查宪法第五章第二十四条第十三项，有关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迹之保存，则政府即应根据宪法，向清室将所有悉数提出，交内务部派专员妥慎保存，或发交古物陈列所，以供人民观览，而免消灭。此事关系国家文化甚巨，政府究以何法制止清室变卖，及如何飭地方官厅侦查陈宝琛郑孝胥等盗卖之处，谨依宪法第六十七条提出质问，请于三日内明白答复，提出者李燮阳、王乃昌、牟琳等六十六人。”³

对于哪些属于清室私产，哪些应属于国有，也提到了议事日程。1924年5月3日，总统曹锟派冯玉祥、颜惠庆、程克等10人为保存国有古物委员，会同清室所派会员10人，共筹保管办法。5日在时任内务部总长程克的宅中召开保存国有古物讨论会，讨论保管办法，“其所决定者，为凡系我国历代相传之物，皆应属于国有，其无历史可言者之金银宝石等物件，则可作为私有。属国有者，即由保管人员议定保管条例，呈由政府批准颁布，即日实行。其属于私有者，则准其自由变卖，此项保管条例已在起草中，大约明后日即可提出讨论，俟通过后，即呈由政府颁布。”⁴

清室重视这些宝物，主要还是它的经济价值，既用它维持庞大的日常开支，又要满足复辟活动的经费。保护这些珍宝文物又与坚持居住在紫禁城内廷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珍宝文物数量巨大，如果迁居颐和园，就难以完全带出。1924年春，金梁在当内务府大臣前两个月给溥仪上条陈：“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转乾坤，经纬万端，当先保护朝廷，以固根本；其次清理财产，以维财政。盖必有以自养，然后有以自保，能自养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三者相连，本为一事，不能分也。”他提出应进行财产清理，其中的宝物，“各殿所藏，分别清检，佳者

1、 《亡清故宫失火之责任问题》，《京报》1923年6月28日。

2、 1923年制《中华民国宪法》(即曹锟宪法)第二十四条第十三项规定：“关于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迹之保存由国家立法并执行，或令地方执行之。”

3、 《李燮阳质问清室盗卖古物》，《申报》1924年3月15日。

4、 《清室古物仍难自由拍卖》，《申报》1924年5月8日。

永保，次者变价，既免零星典售之损，亦杜盗窃散失之虞。”^{〔1〕}1924年5月，溥仪曾去颐和园一游，这不仅使紫禁城大为震惊，甚至京、津一带的遗老也忧心如焚，5月26日，升允、袁大化、张人骏、陈毅、万绳栻、罗振玉等联名奏云：“窃臣等闻前日圣驾巡幸颐和园，即日回跸，寻常游豫，本是细故，然臣等有不胜忧虑者……盖民国虽覬觐皇室宝物，尚未侵入禁御也，若圣驾遽行移驻，则民国求之十余年不可得，虽以袁世凯之窃凶极恶，尚未敢公然启请者，今乃于中无意得之。翠华一发，彼必据约为辞，禁中不可复回，宝物自归彼有。”^{〔2〕}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第五款规定：“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应区分公产、私产，但怎么划分，以什么作标准是人们关注的。1924年11月5日溥仪出宫，《晨报》指出：“溥仪之废帝迁出皇宫，此本不成问题，所足注意者，存在清室之一切物品，多为数千年历史之所遗留，而与文化有密切关系，溥仪既已离宫，则此不可以价值估计之宝物，当然应由接受保管者负其全责。……故此公产私产如何划分，划分之后，应由何人点收，何人保存，其标准方法皆不可不从速规定”^{〔3〕}。《社会日报》则明确提出以“有无历史的价值及与文化有无关系为标准”^{〔4〕}。对于清室古物的处理意见也有不同的声音。胡适赞同对清室古物永久保存，收归国有，但他认为，此项古物属于清室私产，“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5〕}。胡适的观点受到了知识界的猛烈抨击。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变革早已使帝制成为历史，因帝制而存在的皇室古物自然应归国有。对于清宫公产的具体划分，在实际中并没那么复杂，例如，藏于库内的元宝银，共6333斤，合101328两，因该元宝均镌有福祿寿喜字样，每颗均重达10余斤，确系当时清帝用以为犒赏之用者，遂留数颗以为将来陈列展览所用，其余则悉数发还^{〔6〕}。溥仪两次派人到养心殿取东西，曾要求带走乾隆瓷器及仇十洲《汉宫春晓图》，委员会未允许，惟取走不少衣物首饰，所带走的物品详帐，已附记在《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三编第四册《养心殿报告》后。驱逐溥仪出宫时，即点收印玺，搜查他的行李，发现了藏在其中的《快雪时晴帖》，便扣留了下来，因为这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艺术品，不能视为他的私人财产。

这一争论的过程，使社会在清宫珍藏上有了共识：其一，在价值上，这些珍藏反映着中华数千年文明，关乎中国历史文化，为立国精神的寄托，决不是一般的古董珍玩；其二，在所有权上，这

〔1〕 前揭溥仪《我的前半生》，页113。

〔2〕 《升允等谏阻移驻颐和园摺》，《时报》1924年8月10日。

〔3〕 《溥仪昨日迁出皇宫 可注意清室古物之保存》，《晨报》1924年11月6日。

〔4〕 《对废帝之善后》，《社会日报》1924年11月7日。

〔5〕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页271，中华书局，1979年。

〔6〕 前揭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一，页15。

些珍藏为历代帝室递嬗相传，并非一代一人所得私有，因此是国家的财产；其三，在保护方式上，应该设图书馆与博物馆，集中保护。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使清宫旧藏的身份、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们已不再是封建帝王权威和财富的象征，也不再是皇帝个人摩娑欣赏的珍玩，它们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人民共享的文化财产，且被赋予中华文明血脉的意义。但是，这个认识的提高不是直线的、一帆风顺的，往往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激烈的争辩相伴随。换言之，并不是所有人对清宫旧藏以及紫禁城古建筑的价值都有客观的、正确的认识。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关于“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提案很有代表性，这里略作介绍。是项提案，经亨颐提出了五项理由，其中之一：设故宫博物院，就要“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物事应当如何办的，岂不是预备将来哪个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等处吗？”之二：“皇宫物品为什么要重视？据我的理想，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将拍卖大宗款项，可以在首都造一所中央博物馆。”^①故宫博物院同人向社会各界大力宣传：“无论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②驳斥经亨颐提案之不当，请各界主持保全故宫博物院。而对经氏提案进行全面深入批驳者，当为张继以“大学院古物保存委员会主席”名义向中央政治会议的呈文。

对于经氏的第一项理由，张继驳斥：“是说诚荒唐之尤者。研究以前的历史，是完全学术之供应，而非为实行彼时之现象。”如医生研究病状，是为得治病之方法，而绝不是预备患此病也。“故宫博物院亦何不可作此观察？参观者见宫墙高且多，无异囹圄，见宫中生活之黑暗，一无乐趣，或可兴起其薄视天子重视平民之念乎？”对于“逆产应当拍卖”之说，张继反驳：“逆产应否全数拍卖，已成问题。法国大革命，其雄伟之风，激昂之气，迈越往古，为后来各国革命者之先导。然方其拍卖法王室之产业也，亦有‘与历史有关之建筑物物品等除外’之令。且故宫已收归国有，已成国产，更何逆产之足言？故宫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数之博物院也，保护故宫，系为世界文化史上尽力。”^③

尤为重要的，张继文末以世界文化古迹及世界博物馆的宏大视野，指出故宫、故宫文物及故宫博物院的价值与意义：“现欧洲各国，为供历史之参考，对于以前皇政王政时代物品，莫不收罗保存，惟恐落后。即苏俄在共产主义之下，亦知保护旧物，供学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以外，皆寄于残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陈设，虽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价值。明清两代，海航初兴，西化传来，东风不变，结五千年之旧史，

① 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二，页31—32，故宫博物院编，1932年。

② 《故宫博物院开放三天 接收委员函请维持该院原案》，《申报》1924年7月14日。

③ 前揭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二，页35—36。

开未来之新局，故其文化，实有世界价值，而其所寄托者，除文字外，实结晶于故宫，及其所藏品。近来欧美人士，来游北平，莫不叹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数。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应为世界惜之。”^①

经亨颐是个民主革命者、著名的教育家。他对故宫博物院及清宫旧藏的认识是片面的，这既有以推翻帝制为职志的一些革命者的感情因素，同时也由于对故宫及故宫文物所承载的多重政治文化内涵解读的差异所致。应该看到，拥护故宫博物院、认识故宫文物价值的是多数，但持有经亨颐态度的人相信也不是个别的，这里试举蒋介石对故宫的印象。1928、1929年，蒋介石曾两次到故宫，日记中载有其观后之感受。1928年7月22日：“上午记事：到太和殿对北平警察训话毕，游览太和、中和、保和三殿。殿宇之宏大不如门楼，保和殿（按：原文如此）则更大矣。游保和殿（按：似乎应为武英殿），古董甚多，玩具亦精，国家元首而以此为宝，则焉得而不亡也。”1929年6月27日：“下午，到清宫参观几遍，只感宫殿生活为一变相之牢狱，其腐败、污秽、杂乱，不堪名状。观其历代帝王之像，以顺治为首，次则乾隆，其余无足观者也，只可作为遗迹而已。”6月28日：“下午……游观雍和宫，污秽之处也，其拉马堪布之污浊，亦令人欲呕。”^②对于封建帝制的残余物（紫禁城及其他皇家建筑和古物），时人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即是在当下，对故宫与故宫文物价值的认识，仍在不断地深入。

三

故宫及其藏品的特殊价值，决定了故宫博物院的使命与地位，也使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在中国博物馆事业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贯穿其中的“公”字精神，则是故宫博物院保持其生机与活力，亦即成为一个活故宫的保证。

如何管理故宫及清宫珍藏，在溥仪出宫的第三天即1924年11月7日，即发布了将清室宫禁充作博物馆的大总统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著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众。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远。”^③社会上这一呼声也很高。国立八校联席会议曾专门召开会议，集中讨论清室古物保管问题，并形成决议：“清室古物，于文化上有极大关系……希望其成立一完全美满之图书馆与博物馆，由国家直接管理，并邀请各机

① 前揭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二，页35—37。

② 以上抄自《蒋介石日记》，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③ 转引自前揭《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页292—293。

关参加监视，期在公开保存，俾垂久远。”^{〔1〕}

1848年，西方的博物馆作为一种新事物被介绍到中国。1898年维新运动期间，中国建立博物馆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1905年，在江苏南通建立了第一个公共博物馆。中华民国建立，社会文化教育活动陆续有所兴办。1912年在北京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1914年建立古物陈列所。1915年在南京明故宫旧址建立南京古物保存所，陈列明故宫遗物。1921年全国已有13所博物馆^{〔2〕}。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故宫博物院的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故宫及其藏品，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建筑物与一般的文物珍品，它的成立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这里需要谈谈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古物陈列所为民国政府内务部所设，其设立宗旨是：“默察国民崇古之心理，搜集累世尊秘之宝藏，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院之先导。”^{〔3〕}古物陈列所设在紫禁城前朝的武英、文华二殿，展品来自奉天(今沈阳)故宫及热河(今承德)行宫，也都是宫廷文物。此为第一个以帝王宫苑和皇室珍藏辟设的博物馆，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在1914至1924年的十年间，在逊帝溥仪仍居后宫，封建复辟阴影几度笼罩下，有论者认为，古物陈列所犹如一面共和大旗，在封建堡垒的中心猎猎飘扬^{〔4〕}。也有人认为，古物陈列所代表了我国20世纪20年代博物馆的水平，也受到观众欢迎^{〔5〕}。但是，古物陈列所的不足是明显的，“陈列所”的定位使它在发挥博物馆功能上存在欠缺，展品陈列“殆如骨董店耳”^{〔6〕}、“纷若列市，器少说明，不适学术之研究”^{〔7〕}的批评不少。特别是北洋政府以各种名义提取古物陈列所文物，例如国务院秘书厅为“惠赠”友人，1918年9月11日与11月15日提取文物64件，1919年6月18日与8月16日两次又提走21件，主要是各种精美瓷器，还有珐琅器、古铜器等，乾隆款冬青釉中碗一件，估价仅1角钱^{〔8〕}。当然这种状况后来得到纠正。1926年又设立鉴定委员会，分书画、金石、陶瓷、杂品四组，从社会上聘请了一批专家分任鉴定。业务建设也得到了发展。应该说，古物陈列所对于故宫博物院，也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1948年，古物陈列所正式合并到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博物馆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神秘的紫禁城内廷，无与伦比的文物瑰宝，曲折的成立经过，新型的管理体制，法律文件的保障，奋发向上的气象与卓著的工作成就，

〔1〕 《教育界与清室古物 无非希望公开保管 尚未达到具体办法之机会》，《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3日。

〔2〕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页8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 《内政部设立古物陈列所有关文件》，转引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页268—269。

〔4〕 段勇：《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5〕 前揭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页81。

〔6〕 《鲁迅日记》1914年10月24日，《鲁迅全集》第15卷页13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7〕 《顾维钧等筹设中华博物院的有关文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页286。

〔8〕 《国务院秘书厅为“惠赠”友人提取古物陈列所古物清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页220—222。

特别是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都使故宫博物院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正如马衡所说：“吾国文化上之建设，图书馆方面规模粗有可观；而博物馆之设施，尚在萌芽。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至北京，陈列于武英、文华二殿，设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①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促进了中国博物馆学科的形成。

故宫博物院的意义至今仍是学人研究、阐发的重要课题。有人认为，“它标志着博物馆在中国的社会化，也标志着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博物馆的社会化表现为博物馆塑造民族国家群体身份，吸引广大民众的参与。博物馆知识从少数精英扩大到更大的社会民众层面，使得原来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大众化了”^②。有人注意到了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以文物南迁为例，“在某种程度上，它所带有的象征意义尤为重大，在战时保存国家文化命脉，是免于民族沦亡的重要手段，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生存的决心。在这个语境中，文化遗产所传达的意蕴，又一次超乎了遗产价值本身”^③。还有人注意到故宫博物院的政治性，“极有意味的是，经由学术、知识和文化的包装，故宫及其文物由帝王私有财产转化为博物馆的公共空间和公有藏品，故宫博物院政治性并未因此削弱。相反的，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的联系，皇室文物公开与民主共和的想像，得到公开而深刻的阐述。自此之后，社会对故宫、故宫文物及故宫博物院的记录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书写”^④。

社会期望故宫博物院成为一个“完全美满”的文化机构，那么，故宫博物院应该具备一种什么精神，才能使它不负众望，永葆其生机与活力？1929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周年，此时故宫博物院经过建院初期的曲折纷乱，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好时期，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兼理事长，李煜瀛先生有个讲演，对此作了回答。他指出清故宫须成为活故宫，活故宫的精神在于坚持一个“公”字：“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一个死的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以前之故宫，系为皇室私有，现已变为全国公物，或亦为世界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余素主张，使故宫博物院不为官吏化，而必使为社会化，不使为少数官吏的机关，必为社会民众的机关，前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时代，曾请助理员顾问数在百计，帮同点查，以示公开，即现在此工作人员，薪水微薄，因彼等目的，非为权利，实在牺牲，共谋发展。总之故宫同人，在此四年中，对于一公字，已经做到具体化。”^⑤这种“公”，即公开、公共，面向公众，社会参与。故宫博物院从点查清宫物品、具体筹建以及成立后的业务工作多个方面，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公”的精神。

① 马衡：《组织中国博物馆学会缘起》，《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5年第1卷第1期。

② 徐贲：《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

③ 郭长虹：《故宫图像：从紫禁城到公共遗产》，《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1-2期。

④ 徐婉玲：《记忆与认同：故宫博物院1925—1949》页53，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未刊稿。

⑤ 《清故宫须为活故宫》，载《李石曾先生文集》下册，页241—24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辑出版，1980年5月。

1924年11月5日把溥仪赶出故宫，李煜瀛等人即与冯玉祥、黄郛商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事。“二君欲由我委员长，由政府明令发表。吾允担任，但须多容纳几分社会乃公开性质，不作为官办。遂决定委员长与委员不用任命而用聘请，并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同时并言及博物院事。”^①为了顺利进行清宫物品点查工作，清室善后委员会特制定了18条《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对于人员组成、点查程序、应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规定。溥仪出宫后，社会上出现了冯玉祥、鹿钟麟、张璧等人盗窃宫中珍宝的谣言，而且愈传愈广。制定如此严密的规定，就是为了有利监督，公开透明，取信于社会，也为了妥善地保护好这些文物珍品。从1924年12月24日开始点查，至1930年3月基本上结束，为了让社会及时了解点查情况，清室善后委员会先后公开刊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6编28册。

管理体制上采用了董事会、理事会形式。与当时国内所有博物馆的管理体制不一样，新生的故宫博物院采用了欧美博物馆普遍的管理方式，即董事会、理事会的形式。美国的博物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有董事会或性质相同的委员会。对公立博物馆来说，董事会是体现博物馆属于“公共财产”的具体象征；对私立博物馆来说，董事会制度是“化私为公”的手段。董事会为博物馆的最高权力机构，博物馆的日常事务是由董事会挑选、任命的馆长全权负责^②。故宫博物院成立，制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决定故宫博物院的组织为“临时董事会”、“临时理事会”（包括古物馆、图书馆，“遇必要时，得设专门委员会”）根据“大纲”，分别制定了临时董事会及临时理事会章程。《临时董事会章程》中，规定“本董事会协议全院重要事务，以董事二十一人组织之”，《临时理事会章程》规定“本理事会执行全院事务，以理事九人组织之”^③。理事会实施具体管理，即通过理事所担任的具体行政职务来实现的。从21名董事看，包括了当时政界、军界、教育界、知识界等一批名流，具有代表性。李煜瀛为临时理事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后，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理事会相当于以前的董事会，以前的理事会承担的管理工作则改由院长负责。“本理事会为故宫博物院议事监督机关，决议及监督一切重要进行事项”，包括组织法的修改、院长副院长人选、预算决算、物品保管的监督等。此时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任命的27名理事，包括了国家首脑及政、军、财、宗教、知识、教育等各方面的最有影响力的一批人物，理事们都很看重这一身份，蒋中正就曾以理事名义领衔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完整故宫保护的计划。当然，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中国博物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理事长先后由李煜瀛、张静江、蔡元培担任，1936至1949年不设理事长。选择这种领导体制，体现了对故宫这样一个重要的民族文化财产的慎重态度，反映了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管理“公共财产”的理念，

① 前揭李煜瀛《故宫博物院记略》。

② 段勇：《当代美国博物馆》第二章，页30—34，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 前揭吴瀛《故宫博物院五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一，页54—56。

也是一个大胆的探索，它汇聚了多方面人才，有利于作出更好的决策，后来也保证了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任务的完成。

重视整理出版，让社会更多地了解故宫及其珍藏。故宫珍宝向为皇室私藏，外人难得一窥。故宫博物院通过陈列展览，特别是公开出版，让这些珍宝与公众见面，实现了共有共享的目的。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特别是从1929年到1933年这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古物、图书和文献三馆分别对古物、典籍和档案进行清点整理，同时注重向社会公布，供学术界研究。这一系列成果，集中刊载在一批资料性刊物上，并整理出版了一些档案专辑，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有些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坚持社会性、开放性，故宫学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故宫及其珍藏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也是一门待开发研究的学术沃土。故宫博物院的创始者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李煜瀛在商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就明确提出要“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后又提出，故宫“学术之发展，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①。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与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热，具体说与北京大学国学门有很大关系。当时“整理国故”运动很有影响，1922年北京大学设立国学门，以新的原则和方法研究国学，而且国学研究范围扩大，在研究中也吸取了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等。北大国学门的一批学人不仅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工作，而且把北大的学术风气，研究经验带到了故宫。尤为难得的是故宫博物院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挥学术研究能力的舞台。故宫博物院坚持学术为公器的理念，非常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先后成立了书画、陶瓷、铜器、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宗教经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设计等10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分特约及通信两种。除本院人员，还聘请社会上颇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众多专家学者的参加，有力地指导了业务工作，也产生了不少也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可见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一开始起点就较高，并且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的特点。建院初期故宫学术研究的这些原则、方法以及成果，其实是故宫学的滥觞。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政治斗争、文化演变的深刻的反映，因而也具有多方面的标志性意义。走过86年历史风雨的故宫博物院，承袭了辛亥革命的宝贵遗产，又肩负着时代赋予的任务，在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的同时，也努力通过坚守公字精神使故宫永远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活故宫。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责任编辑：张 露)

① 前揭李煜瀛《故宫博物院记略》，《故宫周刊》总第2期。

The Palace Museum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Zheng Xinmiao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06 to 022.

ABSTRACT: The Xinhai Revolution (The 1911 Revolution) which broke out in 1911 and brought about favorable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eums is regarded as a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its real sense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n 192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lace Museum, which was unaccomplished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ymbolized the victory of the movement in the cultural field. However, small amount of 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latively long interval between the two events led to neglect and poor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s to their interactive influence upon each other, i.e. The 1911 Revolution acceler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turn,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extend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istory. This paper bases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lace Museum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upon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connot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museums, and it tries to objectively present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in which the social events took plac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The 1911 Revolution; Pu Yi's being expelled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The Palace Museum; the landmark significance

On Yi Peiji's Standpoint of Defending The 1911 Revolution from His Refutation of *The Draft History of Qing* (Qing Shi Gao)

Dong Conglin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23 to 032.

ABSTRACT: In December 1929 Yi Peiji who then was President of The Palace Museum submitted an official report to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Government to refute *The Draft History of Qing* (literally: Qing Shi Gao) that had just been published. In the report he in details listed 19 fallacies in his eyes, but the first 7 of which were of politics sharply expressing his standpoint of defending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His behavior was no accident but his firm politics, which can be supported by his impugning *Qing Shi Li Mu* out of the same stand before that. The root cause for his political position can also be analyzed by his career experience. As the result of his refutation, *The Draft History of Qing* ended in prohibition of being published, but arose voices from the different angles which are worthy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the equal value with other data related to the issues concerned.

KEY WORDS: Yi Peiji; *The Draft History of Qing*;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Wu Shizhou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33 to 046.

ABSTRACT: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Xinhai Revolution) ended not in violence but in compromise. Among the major results from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was the "Conditions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the Qing Royal Family". In order to avoid turbulence over the society caused by Beijing coup leading Pu Yi to be expelled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by Feng Yuxiang,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egotiated with the abdicated Qing royal family for the agreement that Pu Yi would put on a look of being voluntary to be away from the imperial palace, which built up the background under which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was carried out at the very incep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The Committee to Deal with The Concerns of The Deposed Imperial Family (Qing Shi Shan Hou Wei Yuan Hui) that was led by Chairman Li Shizeng consisted of social personages and renowned scholar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eposed Qing royal family. The Palace Museum at that time got supports from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ose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were in some sense the self-reprodu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or any 'companie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ized power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